

我在广东找文物

吉笃学：在“年轻”的深圳，炼就探寻古老文明的“火眼金睛”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统筹/邓琼 朱绍杰

日前，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下称“四普”）实地调查验收工作在深圳市启动。在如此年轻的城市里，能找到多少历史文化遗存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跟着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本次验收专家组组长吉笃学参加了此次实地验收工作。

“一眼断代”的本领

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平均人口年龄不到33岁。在这片土地上，吉笃学已经深耕了近20年。深圳福田区的沙嘴遗址在四普登记表中被标注为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专家组一行在河边踏勘时，吉笃学偶然捡到一块石头，他当即判断，这可能是一件石铸的刃部残片，它的年代可能与所登记的时期相符，大致就在商周时期。但随后，他在树下又发现了一块小瓷片，大约只有两厘米见方。瓷片虽小，却有清晰的工艺痕迹。“它内壁带有几道小的凹槽，应该是陶坯没有干的时候，手工在上面划出来的。它的外壁粗糙，还有刮擦的痕迹。”吉笃学一看便说：“这应该是明代嘉靖

万历前后的遗物。”在场几位专家非常惊奇：“你怎么知道？而且还能精确到嘉靖万历前后？”回到车上，吉笃学打开电脑，调出两张图片。一张是他曾在大鹏所城考古发掘时，从明代嘉靖万历地层出土的一张刻槽盆照片，另一张是他搜集到的明代沉船出水的类似器物图片。这一对比，对瓷片的年代疑惑解开了，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暗示着沙嘴遗址可能经历了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吉笃学这“一眼断代”的本领如何炼就？还要从18年前说起。

以大鹏所城为断代标尺

吉笃学是北方人，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以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主，求学也始终在北方。2007年，他随家人来到深圳，恰逢大鹏所城修缮保护项目启动，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就此展开。

从2008年到2010年，吉笃学担任大鹏所城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当时的大鹏所城是深圳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核心是2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谁也没想到，地底下埋藏着更丰富的文物。

“经过两三年的考古发掘，大鹏所城地下出土的青花瓷器数量多到惊人。”据吉笃学说，他自己求学时做的就是史前考古，对明清瓷器并不了解，论断代水平，可能还不如技工。“人家指着瓷片说‘这是明代早期的’，我只能在旁边听着，也不知道对不对。”

更让他困惑的是，在他研读青花瓷领域泰斗张浦生的《青花瓷器鉴定》时，发现书里确定的瓷器年代，和自己从地下发掘出土的瓷片“对不上号”。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怀疑技工的发掘出了问题，就叮嘱他们挖的时候仔

细一点，地层千万不能乱。”但后来，吉笃学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地层没问题，会不会是老先生搞错了？

他开始反复比对实物与文献，逐渐发现，当时国内青花瓷器的鉴定体系还不完善，许多断代结论缺乏扎实的实物体系支撑。一个念头萌生了：“既然没有体系，那我就自己建一个！”

据不完全统计，大鹏所城出土的瓷器残片多达10万件，时代从明代早期延续到清代中晚期，是目前岭南地区青花瓷器最为集中的发现。吉笃学意识到，这对研究深圳600年的海防史有重要价值，以此为依据，还可以排列出中国明代到清代中晚期民窑青花瓷器的基本序列，年代很清晰，甚至可以作为断代标尺，“在没有纪年的情况下，想知道这件瓷器的年代，只需要对照大鹏所城的地层就可以了”。

于是，吉笃学从大鹏所城出土的瓷片入手，一件件拍照、记录、存档，开始了漫长的瓷片数据整理和收集工作。

用15年“笨功夫”建陶瓷数据库

在建立瓷器数据库的过程中，纪年墓是关键。“参照系”。吉笃学解释：“想判断一件瓷器的年代，只要知道某座纪年墓里出过类似的器物，年代就有了参照。”他从元明清瓷器入手，花了三年时间，梳理完全国所有已发表的元明清纪年墓资料。

做完之后他发现，宋辽金时期的瓷片还是不认识，于是又花了两三年时间往前推进梳理。但对汉代、六朝、唐代等瓷器还是陌生。他干脆下决心，从西汉开始，全面梳理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

这一做就是15年。他梳理了全国2800多座纪年墓的资料，收集了全球范围内出土中国陶瓷的160多艘沉船、

200多个窑址的资料，初步建立起一个包含26万张照片、时间跨度从西汉到清代的陶瓷数据库，同时还积累了青铜器、石刻、壁画、陶俑等数据。

他笑着说：“好多人说我傻，别人不想干的活我都在干。最夸张的一次，整理一座墓葬的资料，里面有几百件陶瓷器，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每天一点点扫描、截图、和存档。”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库里数据的不断增加，这套系统的“威力”日渐显现。对于任何一件新发现的文物，只需要与数据库中的器物进行比对，吉笃学就可以快速锁定它的年代。

他还想用这套“笨功夫”，实现一个梦想：“我希望建立一个大的体系，来建立中国的物质文化史。”

吉笃学相信，在AI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项工作的价值会更加凸显。“可能两三年内，我会把这些数据进行转化与应用开发，或接入人工智能系统，这将大大提升文物鉴定的效率。任何对文物感兴趣的人，都能快速检索，了解文物本身的面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和内在价值。”

“80后”文物进入保护视野

“总结起来，深圳有7000年的古文化史，1700年的城市发展史，600多年的海防史。”吉笃学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深圳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达1945处。其中，一些“80后”文物日渐进入保护视野：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孺子牛雕塑、前海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等，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地标，还纷纷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蛇口史迹文物主题游径”还被列入“2024年度优秀文物主题游径”榜单。

吉笃学解释道，从三普到四普，文



吉笃学(受访者供图)

物的内涵与外延是不断拓展的。“昨天的东西，只要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就可以成为文物”。

改革开放文物正是深圳特色。早在1985年，深圳博物馆就成立了特区研究部，专门聚焦改革开放相关的研究。“随着深圳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80后’文物很容易被忽略。”吉笃学表示，它们虽然年代不远，却是深圳从边陲小镇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见证，承载着特区建设初期的集体记忆。他还透露，深圳正在推进申报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历史文化名城，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

作为一名考古研究者，吉笃学深知，对于文物，研究、保护之外更需传播。未来，他希望更多市民能参与到文物保护的行列中，通过考古研学触摸历史，借助科技手段，在博物馆里再现历史情景，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深圳的文化，感知这座城市的厚度。



大鹏所城(资料图)

从“人生识字糊涂始”说开去

□陈漱渝

汉字的繁难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赞美友人石苍舒的书法，写了一首七言古诗《石苍舒醉墨堂》，开头两句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意思是，人开始识字，在扩大知识面的同时，也会引发忧患意识，反而陷入精神困境。

这首古诗创作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866年之后，鲁迅将这诗句“翻造”为“人生识字糊涂始”，并以此为题作文，发表于1935年《文学月刊》4卷5号，后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的主张是：白话文要让读者阅后不感到糊涂，就得要求作者笔下的文字明白如话，尤其要“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语汇”，放弃使用那些似懂非懂的字句。

鲁迅撰写此文的目的配合左翼文化界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以逐步改变方块字繁难的历史状况，让创造文字的人民大众自己能掌握文字。

汉字究竟有多繁难？汉字历史长达8000余年，以甲骨文为标志的成熟文字系统出现，至今约有3600年，中间经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演变阶段，发展而为当下中国大陆通行的简体字。由于汉字一直处于有增有减的动态状态，很难准确说出汉字总数。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105个；据最新版《新华字典》，单字汉字量约13000个。

我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了五年中文，但《新华字典》所收汉字有很多不认识，有些是略知其义而读不准音。我教过十四年中学语文课，备课时离不开的就是

这部《新华字典》；至今在我案头上摆着的仍是这部《新华字典》。《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我，问我如果要置身于无人岛，会带些什么书？我的答案还是《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自1953年初版，至今修订了十二版，总发行量已达六亿册，应居全球书籍发行量之冠。由于汉字的繁难，鲁迅原本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但未完成，仅留下一篇普及性的经典长文《门外文谈》，收入《且介亭杂文》，后曾多次出版单行本。

鲁迅作品为何有“障碍”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公认的语言文字大师，但当今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仍有障碍。究其原因，除了与鲁迅生活的时代有历史的隔膜之外，也有文字方面的原因。

鲁迅曾把自己的创作过程概括为“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鲁迅所说的“凝神结想”，当然包括了对文学语言的字斟句酌。但尽管如此，鲁迅本人也对自己还有不满，表现为被古书耳濡目染，影响到所作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坟·写在〈坟〉后面》）。这是鲁迅的深刻自省和对读者的坦诚，并不是故作姿态。

鲁迅早期出版的译文集《域外小说集》两册（与周作人合译），虽然出版时间晚于同属译文集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但其文学价值及在鲁迅创作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于1909年2月、6月先后在日本东京出版。封面由陈师曾题写的书名中的“域”字写成“或”，这是

“域”的古体字。那时鲁迅正跟章太炎学文字学，认为用古体字题名会比通行字古朴雅致，但今天的年轻人读来就可能不认识。

鲁迅其他作品中有些文字有时也让人疑惑。小说《白光》中，主人公陈士成参加“县考”十六次，屡试不第，在幻觉中他“一经攀援上去”，使绅士们都来攀亲，乡邻对他神明的敬畏，“门口的旗竿和扁额全都焕然一新”。这里的“扁额”通行字是“匾额”。“扁”是“匾”的古体字，并非错字。小说《高老夫子》中将“小丫头”写为“小鸭头”，“麻将牌”写为“马将牌”，这在当时也是通用词，并非误读和笔误。小说《彷徨》中男女主人公涓生、子君之间的爱情因旧伦理禁锢和经济压迫，由热烈趋于冷漠，涓生觉得子君成了他的累赘：“倘使只知道捉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这里的“捉”，并非敲打的木器，而是名词兼作动词，与异体字中的“捶”相通，是“下坠”的意思。散文诗《好的故事》中“鞭爆的繁响”，“鞭爆”是书面文字，“鞭炮”是常用文字。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写道：“这藤野先生，据说穿着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模糊”的“糊”是“糊”的异体字，当前的通行用词是“马虎”。所以，以一般人的中国文字学养，不能轻易给鲁迅纠错。

尊重经典，有错就改

鲁迅很多用词常有历史痕迹，如他笔下的“较量”相当于当下通行的“计较”（小说《弟兄》），“配合”当下用词是“交配”（小说《兔和猫》）。鲁迅笔下的“石油”指“煤油”（散文诗《好的故事》），鲁迅笔下的“切切察察”通用说

法为“嘁嘁嚓嚓”，“顺顺流流”为“顺顺溜溜”（随笔《阿长与〈山海经〉》）。民国初期鲁迅笔下的“摩托车”即为“小汽车”。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她”用的是“伊”。出版鲁迅著作时，对这种语言文字应一律保留历史原貌，不能按现行编辑方法统一规范，只能补充注释予以说明，这是对文学经典的应有尊重。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鲁迅原著中绝对没有笔误和错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发现有错纠正就好。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开始的时候写“六斤”碰碎的碗写了十六个铜钉才补上，但到结尾却误写为“十八个铜钉”，后于1925年11月23日致李零野信中特别予以订正。鲁迅将小说《明天》的写作时间写为1920年6月，《一件小事》的写作时间写为1920年7月，均系笔误，正确的分别为1919年6月末7月初、1919年11月。知识性的误差也有，如在杂文《记雷峰塔的倒掉》中，曾将杭州的“雷峰塔”与“保俶塔”混为一谈，经编辑孙伏园提醒，立即在《附记》中“特此声明，并且更正”。

《鲁迅全集》是出版界的精品，以校勘比较精确为特色之一。但因为鲁迅作品版本很多，难于汇校，手稿收存也不完整，给校勘带来了极大困难。所以现行版本尚有存疑处。比如《野草·求乞者》中写道：“我厌烦他这追着哀呼”，“厌烦”疑为“烦腻”，因为一是有版本依据，二是跟后文“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者之上者的烦腻”前后呼应。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N先生”留学日本时曾剪发，回国探亲时花二元买了一条假辫子“带”着回家，这里的“带”是“携带”之意，另一版本作“戴”，是结在头上的意思，当更准确。同一作品，“N先生”说“嘴里虽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



AI制图

在额上粘起‘蝎蛇’两个大字”。这个“粘”字是“巾”字偏旁，碑帖、字帖的粘，虽然在古汉语中可以跟“贴”字通假，如《木兰诗》里的“对镜帖花黄”，但不同版本中也曾用过“贴”字，表示粘帖，当更为准确。总之，若无版本依据，对鲁迅笔下的文字不宜妄断擅改，以免佛头着粪。

“愈艰难，愈要做”

最后想提及的是，鲁迅的文字变迁观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把中国文字的改革与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人类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字作为知识的载体既可以从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但特定条件

下也可视为硬实力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能够保持强大和独立。因此，中国文字改革先驱者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汉字拉丁化实验、简体字推行，尽管取得的成果不一，都应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1954年，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现并入教育部。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诸多方面积习颇深，任何方面哪怕进行极微小的改革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告诫我们说：“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以上这段话，可以成为一切有志于中国改革者的箴言。